



尼克松回忆录

上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商务印书馆

尼克松回忆

上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伍任译

郑文华、黄雨石、梁人 校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Grosset & Dunlap
A Filmways Company
Publishers · New York

1978

尼克松回忆录

上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伍任译

郑文华、黄雨石、梁人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4 7/8 印张 350千字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0册

统一书号：3017·237 定价：1.35元

目 录

资料来源和致谢·····	1
早年 1913—1946·····	5
众议员和参议员 1947—1952·····	43
副总统 1953—1960·····	153
普通公民 1961—1967·····	295
1968年的竞选和大选·····	381

资料来源和致谢

这是一部回忆录——一部记忆的著作。由于记忆难免有错和 ix 不可避免地有所取舍，所以每有可能，我总尽量用可以得到的档案资料来核对我的记忆，并以当时的原始材料加以补充。其中有些资料——备忘录、信件、公共文件——是一看就明白的。有些资料则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一向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各种活动和演说，详尽地记录下来。这些笔记，大部分写在律师们常用的黄色拍纸簿上，总数在两万页以上，时间从1946年竞选运动中我的辩论大纲，直到1974年我的辞职演说大纲为止。这些笔记既包括一些即席谈话，也包括一些极为详尽的对话细节。

在1954年到1957年间我任副总统时，我对一百十二次不同的会议、谈话或事件作过日记式的口授录音。我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为什么又停止了，而且这些录音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内容和人物，因而其中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特定的目的。这些日记录在爱迪生录音唱片上，1961年我写《六次危机》时，已转写成文字，但在那本书中，我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些日记，这里还是第一次引用。

由于历史的需要，在《六次危机》中已经谈过的我任总统前的 x 某些事件在本书中也还是要谈到。但是，读者将会发现，尽管这些事件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时间的变迁已使我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而这些新的内容又使我有必要用一种同前一本书截然不同并且更为精炼的方式来论述这些事件。

在总统任期内，从1971年11月到1973年4月，后来又
在1974年6月和7月，我几乎天天都作口授日记记录。在本书中引
用这些段落时都将标明“日记”字样。录下这些日记的磁带，除少
数被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调走者外，全部直到1976年夏天才在圣
克利门蒂将它们转写成文字。现在我从摘录一些段落用在本书
时，没有一处改动不曾在方括号中加以说明。这些口授日记并不
象书面日记那样有条理——我往往会在某一天专谈某一个问
题，但过了一两天又对这同一问题作进一步阐述。正因为如此，在
某些情况下，我常把虽在不同的日子口授但内容相同的条目合并
在一起。但是，有关水门事件的条目却总是保留原来口授的时间和
日期的。

在有关水门事件问题上，我使用了一些已经公开的或是特别
检察官在不同的调查和审讯中已曾使用过的录音抄本。为了尽可
能完整地弄清紧接在水门闯入事件之后那一段关键时期中，我究
竟了解多少情况和干了些什么，我请自我担任副总统以来一直为
我工作的马乔里·阿克夫人，把1972年6月20日至7月20日，
水门闯入事件爆发后我回到华盛顿的那一个月中，我同H. R. 霍
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查尔斯·科尔森的每次谈话的录音都
用打字机打成文字本。我请她把1973年5月我同霍尔德曼的谈话
也打出来，那时我们曾在一起讨论了关于1972年6月23日事件
我们所能记忆的情况，我还授权召开了那次要求中央情报局制止
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会议。

在这些新的录音带中，有许多无法理解的段落。但尽管这样，
我认为，关于那一段时间，我根据这些录音带提出的报道比过去
的一切报道都更为完整。

在本书中，我重述了我的许多谈话，其中有些是直接引用的。
有关水门事件的谈话，基本上都是根据白宫录音带记录下来的话

言。其它的一些谈话是根据我的手抄笔记或我的口授日记。还有大量的谈话备忘录，包括同外国首脑的很多次谈话，而且我还能利用这些谈话来核实和补充我的笔记和记忆。凡我没有参加的那些谈话记录显然是依靠参与者的报道或第二手资料写成的。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来重写出一次谈话的内容，但除了对一些措词非常生动使我难以忘却的谈话，我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办法。

本书如果没有几十个人的帮助，是无法写成或出版的，我谨向所有这些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一些了不起的志愿帮忙的妇女，每天帮助处理寄到和平之家的许多信件，并花了许多时间，对原稿的三次草稿进行了劳累而重要的校对工作。

为了打出手稿和用原稿核对条样，卡西·普赖斯、马尼·帕夫立克、诺拉·凯利、辛迪·塞拉诺-米沙和梅雷迪思·约翰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并花费了许多周末的时间。朱迪·约翰逊帮助进行了种类繁多的打字和研究工作；梅雷迪思·卡希金帮助校对了从我的日记上摘入原稿的段落。当我执政期间的所有文件已被封存时，霍华德·史密斯，一位普通公民，令人感激地把他一整套新闻室每日发布的新闻稿和特别情况简报副本寄给了我们。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罗伯特·休伯特和马克·雅可布森帮助作了许多跑图书馆和核对报纸的工作。

在一部这样规模的著作中，版面编辑需要进行巨大而重要的工作。我愿向格罗塞脱-邓拉普出版社的戴维·弗罗斯特和南希·布鲁克斯所表现的耐心、勤勉和熟练业务能力表示感谢。帮助进行各项其它工作的还有：杰克·布伦南、伯纳德·夏尔-克利夫、拉里·加德、黛安娜·普赖斯、罗伯特和卡拉·阿克曼。索引

是由罗伯特·多尔蒂编制的，照片是在安格里尔的帮助下收集起来的。我还要向我的出版商对我的关心和鼓励表示感谢，他们是：格罗塞脱-邓拉普出版社的哈罗德·罗思和鲍勃·马克尔以及沃纳出版社的比尔·萨尔诺夫和霍华德·卡明斯基。

我要感谢曾参与本书所记事件的数十名我从前的工作人员和朋友们，在我们力求公开而准确地重述那些事件时，他们常不惜花费好几个钟点的时间来帮助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了原稿的某些部分并提出宝贵意见和给予帮助的人们，其中有，集中力量阅读有关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部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专就我总统任期的国内政策部分给予编辑上的帮助和提出意见的雷·普赖斯；以及对有关经济部分提供编辑上的帮助的赫布·斯坦。

xii 罗斯·玛丽·伍兹在圣克利门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她在担任我私人秘书的二十三年中所经历的事件，她还不辞辛劳地详细阅读和订正了原稿。马季·阿克也出来帮助搞这些工作。洛伊·冈特最初为我工作是我还在参议院的时候，他不知疲倦地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用的情况，并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协助我们工作。

最后，还有三个人是从一开始就和我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我在这里要深切地感谢肯·卡希金和黛安·索耶对大部分资料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主要编辑助手弗兰克·甘农组织了这些研究并指导了这项工作。

理查德·尼克松

1978年3月于和平之家

早 年

1913—1946



我诞生在我父亲建造的一所房子里。1913年1月9日我出生 3
的那天晚上，正碰上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巴林达镇历史上空前的寒潮。约巴林达是一个离洛杉矶大约三十英里，住着两百个居民的农村地区，周围是鳄梨和柑桔园林，以及大麦、苜蓿和蚕豆田。

对一个小孩来说，这环境颇有田园诗意。春天，空气中充满着浓郁的桔花香味。这里有许多可以激发孩子想象力的景象：西方朦胧的太平洋海面，北面的圣贝纳迪诺山脉，近处小山脚下那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轻易走近的“凶宅”——还有一条离我家大约一英里的铁路线。

白天，我可以看见火车头蒸气机里冒出来的浓烟。晚上，有时我会被火车的汽笛声惊醒，于是我就梦见许多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见到的遥远的地方。我的弟弟和我扮演着火车司机和列车员，玩着火车游戏。我还记得同住在我们镇上的圣菲铁路公司的一个火车司机埃弗雷特·巴纳姆讲话时的兴奋情景。在整个小学期间，我的志愿是当个火车司机。

我最早的一段明确的记忆是我在奔跑。那时我刚三岁，母亲带着我们驾着一辆轻便马车，她把我的还吃奶的弟弟唐抱在膝上，邻居的一个女孩子抱着我。马飞速地转个弯朝我家奔去，我却被摔在地上了。我肯定大为惊恐，但在我母亲竭力要勒住马时，我却 4
终于爬起来，跟在马车后面跑过去了。这个意外事件产生的唯一后果是，数年后，当头发在左边分梳的发式大为流行时，我却仍不

得不一直往后梳，以掩盖住那次摔下时留下的伤疤。

我们在约巴林达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很愉快。我的父亲只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多亏我们自己有一块菜园和一些果树，所以尽管我们收入很少，我们却还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还有一头牛，供给我们牛奶，母亲用它来为我们做奶油和奶酪。

我六岁开始在约巴林达的小学校里读一年级。我母亲早已在家里教我读过一些书，这种领先使我后来跳过了二年级。

在做完家庭作业和家务劳动后，我常常坐在壁炉边或厨房的桌子边，沉浸于一本书本或一本杂志之中。我们订了《洛杉矶时报》、《星期六晚邮报》和《妇女家庭杂志》。我母亲最小的妹妹奥利夫阿姨和她丈夫奥斯卡·马什本就住在附近的惠蒂尔城，他们订有《全国地理月刊》。每次到他们家作客，我差不多总要借一本回来。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种杂志。

1922年，我父亲卖掉了我们在约巴林达的屋子和柑桔园，我们迁到了惠蒂尔。他在油田里做打杂工，尽管工资不低，但对于象他那样胸怀大志，才智聪明，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来说，这种体力劳动不能激起他的兴趣。即便那时汽车还很少，而且在那个地区只铺了一条公路，我父亲早就看到这种不用马拉的车是发展的方向，它的时代很快就会来到。他借了五千美元，买下了连接着两个日益发展的市镇惠蒂尔和拉哈布拉的公路旁边的一些土地。他把这块地清理出来，装上一只油槽和一台抽油机，在这两镇之间八英里的地段上开设了第一个加油站。

这个买卖几乎很快就大为赚钱，于是他马上又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他还设立了一个小柜台，专门出售母亲家制的馅饼和蛋糕。她的拿手之一是蛋白蛋糕。她坚持认为，必须在露天的新鲜空气中把料调制好然后送进烘箱，这样才能做出最好的蛋糕来。我还记

得，在黎明前的寒气中，她站在厨房门外，用一只木制的大匙子使劲地打着蛋糊。

杂货店的营业发展得很快，要不是由于疾病袭击我们的家庭，按当时的水平来说，我们很可能会生活得相当富裕的。

尼克松食品店是一家“夫妻店”；一家人都在店铺里干活。除了招待顾客和记帐外，还得盘货、订货，往货架上上货。店铺每晚都得整理和打扫，而且每天要喷射杀蝇剂。

当我大一点的时候，我接管了采购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工作。每天早晨我四点钟就起床，以便至迟在五点钟到达洛杉矶第七街菜市场。我挑选最好的水果和蔬菜，尽力同农民和批发商讨价还价，希望买得便宜些，然后赶着马车回到东惠蒂尔，把这些货物洗净、分级，送进店铺陈列好，到八点钟再去上学。这种以一个慈爱的家庭和一个小型而紧密的教友会为中心的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但很愉快。二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对愿意艰苦奋斗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有着无穷机会的地方和时代。

相反更相亲这个原理可以极恰切地用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上。在最重要的方面，他俩非常相象。两人都是十分虔诚的教徒。两人彼此十分相爱，为孩子不惜做出任何重大的牺牲。但两个人在气质方面极为不同的程度简直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我父亲弗朗西斯·安东尼·尼克松，在他的一生中，人们都叫他弗兰克。他于1878年12月3日出生在俄亥俄的一个农庄里。八岁时，他母亲患肺病死去，因她长期患病家里几乎已变得一文莫名了。她死后，全家迁到了俄亥俄东部一小块不毛之地去居住，我父亲每天不得不步行几英里，到最近的学校里去读书。一个外来户，加上身材矮小，衣衫褴褛，他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这时候他总以敏捷的口才和一双随时准备好的拳头进行回击，因而不久

他就成了出名的天生的好斗者。

家庭情况始终没有好转，他读完了六年级后，就离开学校去工作。这是一个出于不得已的决定，但他却为此抱憾终身。在其后的几年中，他做过许多工作，每种工作都使他学会了新的技术。他曾驾牛车替一家锯木厂拉木料，他干过木匠，经营过土豆农场，在科罗拉多剪过羊毛；安装过早期的手摇电话机。

我父亲一生都想通过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搬到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当了有轨电车的司机。早期有轨电车车厢里是用大炉膛火炉取暖的，但司机站立的驾驶室却是敞开着的。1906年冬天，他的脚生了冻疮。由于公司不理睬他们的申诉，他于是组织电车司机和售票员进行抗议。他们终于使州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把司机台封闭起来，装上炉子。

6 尽管如此，那次斗争还是使他感到心灰意懒，于是他决定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南部去，在那里至少不会再有冻疮问题了。1907年，他在行驶于洛杉矶和惠蒂尔之间的太平洋有轨电车公司谋到一个电车司机的工作。1908年，他在情人节的一次社交集会上遇见了汉纳·米尔豪斯，结果尽管她的家庭，因她还没有念完大学而且追求她的这个人又不是教友会教徒，而采取保留态度，在四个月之后，他们仍然结婚了。

我父亲具有爱尔兰人的容易发怒也容易欢笑的脾气。我小时候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正是他的这种脾气。他常同我的兄弟哈罗德和唐进行激烈争辩，他们的叫喊声附近的邻居都能听到。他是一个一丝不苟严守纪律的人，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力图以母亲为榜样不去触犯他。也许我对个人之间的争吵的厌恶情绪在我这些早年的记忆中便开始了。

他经常在店铺里同他接待的顾客，几乎可以因任何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他这种感情爆发并非对什么人过不去；这只是因为

他愿意把辩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罢了。遗憾的是，有些顾客并不欣赏这一点，当时我们家常说一个笑话是遇上~~一个比较敏感的~~顾客，我母亲或者我们一个孩子一定要赶紧~~抢先去接待~~，~~可别让父~~亲跟他交上火了。

我如果在进行辩论方面有任何才能，想必也是从我父亲那里，从他对辩论和争论的爱好中学来的。我在~~大学里~~参加了辩论队的时候，他经常用车子把我送到辩论会场去，然后坐在会场后面专~~心~~致志地听着。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对每一节辩论进行详尽的~~分析。

我父亲非常相信美国的“小人物”。他对自本世纪初便如此严格控制美国人生活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机器极为反感。由于他认为美孚石油公司托拉斯破坏了美国的前景，所以当他在惠蒂尔开设加油站时，他就选择了由不太著名的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来供应汽油。随着尼克松杂货店的发展，他于是成了一个大声疾呼地反对连锁商店的人。他担心~~这些~~连锁商店通过大量购买，会挤垮独立经营者和家庭经营的杂货店。

在电视机发明之前，无线电还处于初期阶段的那些日子里，在家庭里和朋友之间的谈话，是人们的一个主要的娱乐项目。生气勃勃的政治问题的讨论一向是我们家庭集会的~~一个~~特色。我父亲开始是一个强硬路线派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人。但1924年时，他开始对哈定和柯立芝的固执保守的共和党纲领不感兴趣了。他的思想开始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那一年，他脱离了共和党，投票选举了伟大的威斯康星的进步党参议员罗伯特·“好斗的鲍勃”·拉福莱特。他甚至成了汤森计划的热心拥护者，这个计划建议，对每一个年满六十岁的人，每月付给二百美元，只要他花掉这笔钱并同意退休。这个计划甚至比新政还更进了一步。1932年，他支持胡佛，因为在禁酒问题上，胡佛是“强硬派”，而罗斯福是“缓和派”。他

从未对我讲过，1936年他投了谁的票，但我总是怀疑，在大危机年代中，他准投了罗斯福的票，而不会选阿尔夫·兰登，他曾把后者说成是“保守分子”。

劳动尊严是我父亲的人生哲学的基础。他说，真的去相信《圣经》上劝导人们依靠上帝过活之后，就只会是鼓励懒惰，他最喜欢引用《圣经》上的话是：“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哥哥哈罗德患肺病的长时间中——那也正在大危机时期——父亲不让他去国内最好的医院之一县里的肺病医院去，理由是如果去那里就是接受施舍。

我父亲的脾气可能由于耳朵有些聋而变得越来越坏，后来他年纪更大，几乎是全聋了。有时候，我简直觉得他是有意引起一场争吵，然后他可以关上助听器，象观看无声电影一样，观看眼前的戏剧性场面。但是正是他那粗鲁、暴躁的外貌下所隐藏着的爱，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1947年，当我随赫脱委员会出访欧洲时，他和母亲来纽约为我送行，帕特和我给他们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招待。他喜欢观看音乐喜剧，我却能够弄到了在百老汇轰动一时的歌剧《俄克拉荷马》最好座位的戏票。我们必须从旅馆赶到戏院，途中，他却发觉他把助听器忘在旅馆的房间里了。他决定不使我们大家扫兴；我记得他当时是多么专心地观看演出，和其余的观众一起大笑、喝彩，让我们觉得他看得非常高兴，尽管他连一个词或一句曲调也听不见。

我父亲对政治的兴趣使他在一开始就成为我事业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在他看来，我的成功意味着，他一直为之工作和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并具有决心，什么目标都能达到。在我当众议员的年代里，我把每日出版的

《国会记录》寄回家去。他总都从头看到底，而这是我所认识的众议员或参议员谁都没有花时间这样做过的。当我竞选副总统时，他写了一封典型的直截了当的信，给他过去几年中曾经阅读过的一家报纸，建议该报支持我，他在信中说：“这个孩子是我抚养长大的五个孩子之一，我认为他们都是美国的最好的孩子。如果你们愿意帮他一把，那我一定说《俄亥俄州报》仍在做点有用的工作。”⁸

凡认识我母亲的人，都深深感到她是一个多么卓越的妇女。她于1885年3月7日生于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有九个孩子的爱尔兰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在她十二岁时，她父亲决定迁居到加利福尼亚教友会的新的居住点去。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包括马、马鞍、门和窗框在内，装满了一节货车车皮，于1897年到达惠蒂尔，在那里我外祖父办了一家苗圃，栽培了一个桔园。我母亲从惠蒂尔专科学校毕业后，进了惠蒂尔学院。她喜欢历史和文学，上语言学系，主要学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当她和父亲相识和结婚时，她刚读完大学二年级。他们生了五个儿子，除了一个以父名命名外，她都是以早期英国国王的名字来为我们取名的：哈罗德生于1909年；理查德生于1913年；弗朗西斯·唐纳德生于1914年；阿瑟生于1918年；爱德华生于1930年。

我母亲一向关心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但她最显著的特性是强烈喜爱独处。尽管她对她的家庭——实际上是对所有的人——充满了温暖和爱，可她是从不让人了解她内心的感情和情绪的。我们进餐时，从来没有不做祷告的，但是除遇上特殊情况，我们每个孩子都被叫出来背诵一段《圣经》外，我们一般总是默祷的。她甚至完全听从马太福音的训谕，一定要关起门来做祷告，因此她晚上就寝前，总要到一间秘室去做祷告。

当我要作出困难的决定或准备演说时，或当我遭到报纸攻击